

中华美国学会

中华美国学丛书

陶文钊 杜瑞清 王旭 主编

# 中美关系与 东亚国际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华美国学丛书

# 中美关系与东亚国际格局

陶文钊 杜瑞清 王 旭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美关系与东亚国际格局/陶文钊, 杜瑞清, 王旭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12

(中华美国学丛书)

ISBN 7-5004-4089-8

I. 中… II. ①陶… ②杜… ③王… III. ①中美关系—二十世纪—文集 ②国际关系—东亚—文集

IV. ①D822.371.2-53 ②D83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2782 号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王应来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8.375

插 页 2

字 数 457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审视中美关系的一个视角 (代序言)<sup>\*</sup>

陶文钊

本次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中美关系。这个命题是这样提出来的：中美关系不是一个孤立的双边关系，它是东亚国际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东亚国际关系、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影响了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也反过来影响了东亚国际关系，影响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研究中美关系可以有许多视角，最根本的当然是研究这两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它们的会合之处与分歧之处。此外，还可以研究国内因素的影响，研究两国不同文化和传统对政策的影响，研究决策者个人的作用，等等，而东亚国际关系也是一个研究角度。

从1784年“中国皇后”号远航中国到现今，东亚国际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前近代时期、近代时期、后近代时期、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下面我们大体考察一下在这些不同的时期，东亚国际关系和中美关系的相互作用。

---

\* 本文是笔者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中美关系”学术讨论会（2002年10月，厦门大学）开幕式上的讲话。从那时以来，国际形势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为保持原貌，笔者没有对论文内容作修改。

## 前近代时期

17 世纪的英国革命开始了世界历史的近代时期。但中国一直到鸦片战争，仍然处在前近代的时期，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国际关系学界一般认为，在前近代时期，世界划分为几个彼此隔离的大陆和地区，国际间形成了几种各具特色的国家体系：东亚封贡体系（或朝贡体系）、穆斯林世界、欧洲秩序以及刚出现的美洲殖民体系。<sup>[1]</sup>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东亚国际体系与世界上其他的几个体系是相互隔绝的。中国由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力强盛，加上强大的“软国力”——具有强烈辐射力的儒家文化，而成为东亚国际体系的中心。这是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等级制的中国外交关系，中国以外的国家和民族，理论上都要向“中央王国”朝贡。费正清把它称做“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统治者甚至一厢情愿地把荷兰、英国也列入了朝贡国之内，所以这个体系被称作朝贡体制，或华夷体制。<sup>[2]</sup>在这一时期，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虽然与中国有了贸易关系，也有一些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没有外交关系，这些国家不是东亚国际关系中的角色。

## 近代时期

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受到内外夹攻，最后分崩离析，中国被迫融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中国充满了灾难和痛苦，以至我们现在谈起来仍然心有余悸。在这个时期，美国不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角。主角首先是英国，其次是俄国和日本，但美国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直到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企图充当列

强对华关系的领导。鸦片战争及此后订立的中英之间的条约促成了中美关系的建立。而中美关系的建立又强化了条约体系，加速了中国融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过程。这一时期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开始受到打击，也就是条约体系确立的阶段；条约体系深化的阶段；东亚国际体系最后崩溃的阶段。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中，美国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第一，条约体系开始确立的阶段。中美《望厦条约》是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推动中美关系的建立，而中美关系的建立又强化了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一个典型例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鸦片战争爆发后，美国社会舆论的主流是谴责英国发动战争的。<sup>[3]</sup>但在中英《南京条约》订立以后，美国政府却认为这是有利可图的机会，立即派遣顾盛（Caleb Cushing）来华，最后与清政府订立了《望厦条约》。与《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相比，《望厦条约》在两个方面都更进了一步，或有了更加明确、更加具体的规定。

#### 1. 关税。条约第 2 款规定：

倘中国日后欲将税率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sup>[4]</sup>

这就是协定关税的来由，从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被剥夺了。而在中英条约中只规定了值百抽五的关税税率。

#### 2. 领事裁判权。条约第 21 款规定：

嗣后中国民人与合众国民人有争斗、词讼、交涉事件……合众国民人由领事等官捉拿审讯，照本国例治罪。

## 第 25 款又规定：

合众国民人在中国各港口，自应财产涉讼，由本国领事等官讯明办理；若合众国民人在中国与别国贸易之人因事争论者，应听两造查找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

这样，中国政府对在华美国人的各种司法权力，包括逮捕、审讯、定罪、惩治的权力丧失殆尽。而在中英条约中只规定，中英民人纠纷应由两国官员共同审理，若确定英人有罪，由英国领事根据本国法律治罪；对英国人的逮捕权则没有涉及。

关税主权和领事裁判权一项是经济权利，一项是司法权利，这两项是条约体系中的核心内容，是清政府丧失的最主要的主权。但当时的统治者没有近代关于国权的概念，他们显然意识不到，这两项规定对国家主权是多么大的侵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首先收回的是关税自主权，然后的修约谈判主要是领事裁判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与美英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时，中国政府首先关心的也是这个问题。而这个在此后整整一个世纪中对中国社会和中外关系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特权正是在《望厦条约》中完全确立的。

根据“利益均沾”的最惠国条款，美国得以享受中英条约中的各项利益，而英国也有权享受《望厦条约》中的各种利益。中英条约、《望厦条约》和《中法条约》共同构成了条约体系的基础，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也使中国与西方列强刚刚建立外交关系，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第二，条约体系深化的阶段。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通过一系列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缔结，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进一步深化，从列强与中国的关系来说，条约体系进一步深化。在这个时

期，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倡导的合作政策、清政府任命蒲安臣出使和《蒲安臣条约》的订立起了特殊的作用。中国台湾历史学家李定一将蒲安臣的合作政策归纳为七点，概括起来就是，列强应采取一致态度和政策与清政府办理交涉；各国决不越出条约规定攫取额外权益；英国要自律，不要处处显出优越地位；不得以上海的租界损害中国领土完整；帮助中国平定内乱仅限于通商口岸；外国人要了解中国文化，并对中国办理外交人员予以宽容。<sup>[5]</sup>可见，蒲安臣倡导的合作政策实际上是美国维护条约体系、维护在过去20年里中国与西方列强建立的关系的努力。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已成惊弓之鸟，他们对合作政策的欢迎是可想而知的。而列强当时基本也赞成这种政策。这种政策确实也起到了作用，蒲安臣因此赢得了清政府的信任。这样也才有清政府任命蒲安臣的出使。

清政府要派出这个使团，主要是出于对来年修约的恐惧。而蒲安臣本人则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第一次要求与西方各国建立关系，意义非同寻常。这个使团对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是两个第一。第一，这是清政府派往外国的第一个使团。在清政府对于国际交往还非常生疏的情况下，派蒲安臣为使节是无可非议的。在蒲安臣于中途病逝以后，钦差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等继续前往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访问，完成了这次出使。以前，只是列强代表走进中国，现在中国代表开始走出去了，而蒲安臣走了这第一步。第二，蒲安臣不顾清政府的规定，实行国际惯例，突破了清政府的“礼制”。在以“礼”治天下的儒教国家中，“礼制”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意义，因为这是“天朝定制”，事关“国体”。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在乾隆、嘉庆两朝引起的震动，至道光朝仍余波未消。在《望厦条约》的谈判中，这个问题就表现得很明显。两广总督耆英以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

阻止顾盛进京，顾盛则利用清政府惧怕外使进京的心理，不时以北上觐见相威胁，迫使耆英作出让步。结果顾盛很快取得订约的胜利。<sup>[6]</sup>在蒲安臣出使之前，清政府对到底应该用什么体制（中式或西式）仍无一致意见，因此总理衙门给他作了许多规定，不让他直接向外国元首呈递国书，因为不知道该行什么礼，等等。但蒲安臣却不管这些规定，一概按照西方外交礼仪行事。他为中国制定了一面黄色国旗，这样，黄龙旗成了晚清中国的象征。他向美国总统亲递国书，按照西方惯例行礼。在他病逝后，志刚、孙家谷等继续前往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访问，顺理成章地照西方礼仪觐见三国君主，而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这样蒲安臣最先动摇了中国传统的仪制。<sup>[7]</sup>

第三，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最后崩溃的阶段。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脱欧入亚，并在 1894 年发动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不是西方列强发动的，而是本来属于东亚国际体系的一个成员发动的。战争的结果是朝鲜最后脱离中国，这样，这个国际体系的最后一个象征也不存在了。因此可以说，甲午战争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最后崩溃的标志。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则是美国为应对这种变化而提出来的。在 70 年代末，史学界有过一场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争论，主要的争论问题是这项政策在客观上对抑制和延缓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否起过一定的作用。<sup>[8]</sup>当时发生这样的争论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大概不会再有这样的争论了。实际上，这个政策不仅在客观上起了延缓和抑制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作用，而且美国决策者在主观上，也是不赞成中国被瓜分的。其原因很简单，如果中国被瓜分了，美国以前根据条约所享有的种种权益如果不是一风吹，至少也要大成问题，更不用说，美国还有进一步在中国扩张的企图。列强在中国的争夺有时会形成合力，以联合起来对付中国；有时它们的力量又相互牵制、相互制约，这也就是清政府要实行“以夷制夷”政

策的道理。提出这个政策不是出于美国对中国特殊的好感或善意，而是出于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但美国的这种利益与中国的利益有某种汇合之处，这也是事实。20 世纪初，日俄战争即将结束时，清政府担心东北被日俄分割和霸占，企图引进其他外国势力，尤其是引进美国势力，保持该地区各国势力的平衡，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完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sup>[9]</sup>

## 后近代时期

这个概念纯粹是从中国融入国际体系这个角度提出来的，提出这个概念，只是为了叙述方便，请不要与一般所说的近代史、现代史混淆。随着 20 世纪的到来，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已经彻底崩溃，中国已经完全融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社会。20 世纪初东亚国际关系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日本的崛起（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和美国势力的扩张（通过美西战争）。美日竞争直到最后爆发太平洋战争是 20 世纪头几十年东亚国际关系最突出的现象。这个时期大致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 世纪的头 20 年。在头 20 年的美日竞争中，可以说日本一直处于上风。1905 年的《塔夫脱—桂太郎协定》，1908 年的《罗脱—高平协定》和 1917 年的《蓝辛—石井协定》正是美日关系中的三个里程碑，每一次都是美国向日本作出让步，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sup>[10]</sup>一直让到巴黎和会，再也没让不下去了，中国人民不同意，美国人民也不同意。威尔逊自己也因为在山东问题上的不光彩表演而众叛亲离，遭到国内反对派的猛烈攻击，以致一病不起。美国对日妥协外交破产。

第二阶段，20 世纪 20 年代。这个阶段是美国联合欧洲列强遏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扩张，各国在华势力进行和平竞争的阶

段；也是日本隐忍待时，积蓄力量，准备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的阶段。80年代国内史学界对华盛顿会议有过热烈的争论，学者们发表过许多不同的意见。<sup>[11]</sup>但我认为，占主流的看法还是承认华盛顿会议是美国外交的一次胜利，是日本外交的一次挫折，而中国则是朝着恢复主权的方向走出了一步。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从1939年中国与列强打交道以来，这是第一次没有丧失更多的权利，而是争回了某些东西。<sup>[12]</sup>中国从此次会议上争回的东西远比中国代表团所提出的要少，对这一点也要历史地看待。中国的利权是在过去80年间通过众多的不平等条约一步一步地丧失的，要通过一次会议就把所有失掉的东西都要回来，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何况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之中，中央政府（北京政府）极其软弱、无能，根本就不能担当起收回利权的重大责任。

历史上的许多东西有相似之处，有可比性。如果把《九国公约》和蒲安臣的合作政策相对照，我们可以看到两者颇有相似之处。两者都要求列强协调对华政策，都要求列强与中国的当政者合作，都反对任何一国向中国要求超过条约权利的特权。可以说，合作政策是《九国公约》的雏形，而《九国公约》是合作政策在20世纪的发展。不同的是，合作政策要求英国克制，而《九国公约》则主要是为了约束日本。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持东亚现有的秩序，保护列强在现有条约框架之内在中国的有序竞争。

第三阶段，从日本发动“九·一八”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企图突破东亚现有国际格局、称霸东亚的一次努力。美国（尤其是在罗斯福时期）不是不想维持东亚的现有秩序，但大衰退搞得美国自顾不暇，而日本还没有做好各种准备，还不敢一下子就彻底废弃现存的东亚国际体系，所以日本发动战争是分三步走的：第一步，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全部和华北部分地区；第二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第三步，发动太平洋战争。从“九·一八”到珍珠港，共用了十年多的时间，这十年也是东亚国际关系大调整的十年。总的来说，这十年中美国的政策是从对日妥协到对日强硬，从试图保持“中立”、竭力置身事外到投身其中，从对中日的不偏不倚到援华制日，直至联华抗日。这个过程是曲折的，中间有反复，但只要我们把握了这个总的趋势，许多事情就比较好理解，比如 1941 年的美日谈判。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敌我分明，东亚国际关系变得简单化了。但在盟国内部，在关于战后建立什么样的国际关系的看法上不是没有分歧。美国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老的殖民体系是维持不下去了，美国要代之以新的势力范围体制，把东亚纳入它的势力范围，而英国则力图维护老的殖民帝国。在 1942—1943 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中，在关于战后香港的归属问题上，美英的分歧就表现得很明显。在罗斯福的设想中，战后的东亚将与战前大不相同：日本将被彻底解除武装，英国要从它的殖民地退出，中国将在东亚发挥国际警察的作用，美国的东亚政策将以与中国的密切合作为基础。<sup>[13]</sup> 他的这个政策受到苏联和英国的抵制，在有些方面他得以克服它们的抵制，如在中国参加 1943 年的《普遍安全宣言》和参加 1944 年底筹备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问题上；在有些方面，他也只得向它们作出让步，最明显的是在 1945 年 2 月的雅尔塔会议上（这种让步实际上是符合美国关于势力范围的设想的）。雅尔塔会议和由此次会议确定的国际格局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东西方两个集团的均势，以致朝鲜战争这样一场残酷的战争也不能将它打破。

## 冷战时期

在整个冷战时期，对中美关系起主要作用的第三者当然是苏

联因素。具有戏剧性的是，在冷战初期和后期，苏联因素对中美关系起了截然相反的作用。在冷战前期，中美关系可以说是东西方关系的一部分。中苏同盟的建立对美国决策者试图在中苏之间打进楔子的希望以沉重打击，对中美对抗格局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sup>[14]</sup>中苏关系的破裂使美国决策者意识到共产主义世界不再是铁板一块，对中美关系的解冻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中美关系的解冻是冷战时期最主要的地缘政治变化，它改变了地缘政治的版图，改变了力量的对比，形成了一个大三角的国际政治格局。称之为大三角，并不是说中国的实力与两个超级大旗鼓相当。但中国这个砝码加在哪一边，都是另一边所不堪忍受的。在大三角关系的 20 年中，情况也有变化。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积极实行联美反苏的战略；1982 年后，中国重又强调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在战略上与美国拉开了距离。<sup>[15]</sup>美国几乎总是把对华关系置于从属于对苏关系的地位，当对苏缓和得势时，中美关系就出现停滞，而当对苏缓和受挫时，中美关系就会改善。中国经常埋怨美国站在中国的肩同上苏联改善关系，这种埋怨恰好反映了中国的弱势，也反映了美国的政策目标。<sup>[16]</sup>苏联从 1982 年后才开始对中国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仍然是曲折的，而且也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1984 年的情况就比较能说明问题。这年 1 月中国总理访问了美国，4 月里根总统回访了中国，中美关系在 1983 年的挫折和停滞后出现了改善势头，中国向美国采购武器事宜也在商谈之中。而 4 月，苏联和越南在南中国海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中越的边界冲突达到 1979 年以来的最高峰。苏联第一副总理阿希波夫本来要在 4 月访问中国，却被苏联方面推迟到 12 月下旬。<sup>[17]</sup>顺便说一下，关于大三角关系和中苏关系正常化还有许多问题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

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中其他的第三者因素主要还有朝鲜和越南。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因素与苏联因素一样，在不同的

时期对中美关系起了很不相同的作用。朝鲜战争的爆发，美中两国先后卷入战争，使中美关系对抗和隔绝的格局确定了下来。朝鲜战争后，美国仍然把中国当做“军事侵略者”，在东亚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主要变成遏制中国，这是朝鲜战争的又一后果。<sup>[18]</sup>有意思的是，朝鲜在当年是促使中美走向对抗的因素，而半个世纪以后，它却又成了中美两国的共同的安全关注，成为中美两国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1993年朝鲜半岛的核危机对中美关系走出困境无疑是有帮助的。此后若干年内，中美两国在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方面、在四方会谈中进行了建设性的合作。这也是值得深思的。

越南的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要更复杂些。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南部边界是美国的一条遏制线，美国陷入越南战争是为了遏制中国共产主义的“扩张”。中国援越抗美是中国60年代支援世界革命的主要行动，也就是说，越南的战争促使了中国的革命外交路线的发展，促使了中国继续对美国采取强硬的立场。后来，如果越南自己不首先迈出缓和与美国关系的步伐，中国领导人要作出打开中美关系的决定，至少会困难得多。从美国方面来说，这一时期中美两国在越南的间接战争，推迟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进程，但同时也为美国政府根本改变其政策创造了必要的主客观条件。<sup>[19]</sup>后来，当邓小平决心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时，越南问题也是他考虑的因素之一。1979年1月末，他访问美国也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sup>[20]</sup>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在1978—1979年，越南因素促使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 后冷战时期

关于冷战什么时候结束，国际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从冷战是两个集团意识形态的对抗出发，认为戈尔巴乔夫在

1987年提出新思维时，两个集团的意识形态对抗结束，冷战实际上也就结束了。有的学者从冷战的主要表现是美苏在欧洲的争夺出发，认为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是冷战的结束。有的学者从美苏两个冷战的主角进行冷战的能力出发，认为1991年8月苏联解体是冷战的结束。<sup>[21]</sup>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笔者认为，冷战结束是一个过程，我们可以暂且把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阶段称作冷战结束的时期。

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有一些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显著特点，诸如：两极格局解体，多极化趋势曲折发展；经济因素上升，意识形态因素下降；大国关系调整，伙伴关系成为一种时尚；每个国家都追求各自的民族利益，即使有同盟关系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同盟也不再是以前那样的同盟。近年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欧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不断发出与美国不同的声音就是一个例证。在亚洲也是如此。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之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对华实行制裁。日本就是在美国的盟国中最早打破这种制裁的。1989年8月8日，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南方遭受水灾地区提供价值200万美元的紧急物资援助；9月，日本政府解除了对日本人访问中国的限制；11月20—21日，第四届日中友好交流会议在东京举行；12月5日，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近50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协议在北京签署；1990年1月，中国国务委员邹家华访问日本，8月，海部俊树首相访华；1992年4月，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了日本。<sup>[22]</sup>在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中日的这些交往对于中国摆脱外交上的困难局面，重新掌握主动权是十分重要的。这种情况在冷战时期是不可能出现的。20世纪50年代，日本极力想发展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但由于美国的反对和严格控制，中日贸易始终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对日本对华出口的控制始终比对参加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其他国家更加严格。<sup>[23]</sup>这里笔者只就与本文有关的两个问题简

要地谈些看法。

(1) 美国对中国新的遏制政策有没有可能？这是美国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都很关心的问题。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共识消失，此后，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处在辩论之中。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现在，一直有美国学者主张遏制中国，<sup>[24]</sup> 中国学者也担心美国对华政策的逆转。但笔者认为，遏制政策是一种过时的想法。

第一，什么是遏制政策？遏制政策是一个与冷战相关的概念。在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那种政治上全面排斥，军事上对抗，经济上全面封锁，那就是遏制政策。现在美国对华政策与那时的政策显然不同。

第二，现在有没有遏制政策？有的，如美国对古巴、伊拉克、伊朗、朝鲜的政策仍然是遏制政策，或者基本上是遏制政策，或者还不止是遏制政策。但那种政策与美国对华政策显然不同。

第三，虽然在美国一直有人想遏制中国，臭名昭著的蓝队仍然存在，2003 年 7 月，美国国会“中国安全评估委员会”的报告也是遏制论的反映。<sup>[25]</sup> 但遏制中国的主张不是美国占主流的意见，既不是民主党占主流的意见，也不是共和党占主流的意见；既不是克林顿政府的政策，也不是布什政府的政策。

第四，即使美国想遏制，客观上能不能做到？显然不能。首先，中国的情况已经不是二十多年前了，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国际社会；其次，各个国家都在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已经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追随美国了。洛德在助理国务卿任上时曾说：“我们在中国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在我们同中国人较量的时候，我们的欧洲和日本朋友袖手旁观，而且他们抓住机会同中国人签订了合同。”<sup>[26]</sup>

1997 年以后，美国的一些主要盟国都没有再与美国一起在联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共同发起攻击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这在冷战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上面关于日本的例子也很说明问题。而没有国际社会的合作，遏制也是行不通的。

第五，中国是大国，而且是核大国，美国对待大国和小国的政策是不一样的。显然，主张遏制中国人的思想没有与时俱进。时代发展了，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冷战时代。当然，现行美国对华政策中确实还有防范中国、牵制中国这一面，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对此我们决不能放松警惕。

(2)“亚太小北约”有没有可能？前些时候，国外有人讨论亚太小北约，似乎美国可以把它在这一地区的盟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再加上菲律宾、新加坡等撮合在一起，搞成亚太小北约。国外有这种议论，国内就会有所反应。这种议论与两个问题有关：一是上面提到的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果然搞起这个小北约，显然是为了遏制中国的。二是北约东扩。北约确实还在继续东扩，但我们看到现在的北约已经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盟国体系正在向非传统的联盟体系转变。这种转变表现在：随着许多比较弱、比较小的国家加入北约，北约的军事功能在削弱，而政治功能在增强；美国的单边主义进一步发展，对盟国的依赖降低，这在阿富汗战争中可以明显看出；欧洲盟国不满美国的单边主义，跨大西洋联盟削弱，在巴以冲突和伊拉克问题上，一些盟国公开唱反调，这是冷战时期难以想象的。这一点美国决策者自己也感觉到了。2003年9月初，美国国务院和国家情报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关于全球反美主义的讨论会上，国务院的工作文件就指出：“跨大西洋关系的削弱是特别令人担心的，这是反美主义高涨的一个因素。”美国有的战略家开始设计以“后冷战时期”的联盟结构来取代冷战时期盟国体系，就是在一个时期内针对一个主要威胁结成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联合战线，类似在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中的模式，<sup>[27]</sup>所以我觉得亚太小北约缺乏现